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两个结合”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靳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坚持“两个结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以坚定理想信念和高度历史自觉开拓进取,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成功之道。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本土化才能落地生根,时代化才能充满生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实践依据和深厚文化底蕴。“两个结合”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两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社会矛盾,面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要求,自然存在着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时代坐标,根据新的情况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成果,才能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仅党和人民事业无法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落地生根、深入人心,为人民群众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就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等结合起来,形成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的表达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内容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既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焕发蓬勃生机,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深刻认识坚持“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我们党自诞生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既不丢掉老祖宗,又讲出许多新话,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10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指导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无论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的开辟,还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无论是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都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作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勇于推进理论创新的典范。这一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一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善于从五千多年的深厚文明积淀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极大鼓舞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力量,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雄辩的事实证明,只有坚持“两个结合”,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指引党和人民事业不断胜利前进。

当前,我们党正带领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大胆探索,还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需要直面和解决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这要求我们继续坚持“两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把化解矛盾问题的思路办法和新鲜经验转化为理论话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沃土中汲取历史经验、人文精神和民族智慧,不断作出理论创新,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想理论支撑。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新的征程、新的实践,给理论创新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我们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创新理论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最大限度激发人民实践创造的热情与活力,及时发现、概括、总结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好做法、好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和政策并指导新的实践。在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在回应人民现实的需要与关切中,不断增强理论的生命力、解释力与创新力,形成“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强大思想武器。

不断回答新时代新征程提出的新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理论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要认真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聚焦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在研究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回答好“中国之问”,立足基本国情,紧贴亿万人民创造性实践,回应实践发展的新要求,对未知领域大胆探索创新,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回答好“世界之问”,以天下情怀和世界眼光分析世界发展变化形势和趋向,为解决好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回答好“人民之问”,聆听人民心声,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回答好“时代之问”,站在时代发展潮头和人类发展前沿,作出更多引领时代潮流的理论创新。

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事,去挖掘、去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深入挖掘运用中华文化丰富宝藏,使激活传统与弘扬传统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厚植理论创新的历史根基、文化血脉,提出更多蕴含中国智慧、体现中国精神的思想观点,赋予党的创新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中华文明增添新的生机活力,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思想力量。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

中国社会治理为人类治理文明注入新内涵

■郭晔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蕴含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脉络中,凝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经验,现代治理精神和中华善治传统在新时代交相辉映。只有将社会治理现代化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和理论框架中进行观察和思考,才能清晰把脉其实践逻辑、明确其未来走向、展望其美好前途。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观之,我国社会治理具有独特优势和鲜明特色,为人类治理文明注入了新内涵。

以包容性秩序为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确保社会既充满生机活力又保持安定有序。处理好秩序与活力的关系,是社会治理中面临的重要课题。秩序是内敛的、安定的、平稳的、合乎理性的,活力是延展的、流动的、活跃的、合乎自然的,这种包容性秩序,考验的是实现二者平衡的艺术。包容性秩序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而不同的秩序,保障人权、规范公权、维护私权的秩序,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度的秩序,平等参与、民主协商、多元共治的秩序,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相统一的秩序,现代精神、传统文化、世界文明相兼容的秩序,共同富裕、人的发展、社会进步相并行的秩序,是“活力”内在于“秩序”之中的一种社会文明样态。构建包容性秩序,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运用系统思维,做到统筹兼顾。一是统筹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既着力解决各领域各方面存在的矛盾问题,又筑牢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民生基础工程,从根源上降低矛盾发生率。二是统筹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既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又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是统筹社会治理与社会心理服务,既防范外在风险、提升社会整体安全系数,又预防内在危机、呵护个体心灵的安全感,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以市域社会治理为抓手。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贯穿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国家到家庭等不同治理层级,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不同的治理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各类要素越来越向市域聚集,市域社会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以市域社会治理为抓手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一要发挥市域立法权的制度优势,科学处理上位法与下位法、硬法与软法、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充分发挥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建立更加成熟完备的社会治理规范体系。二是抓住乡村振兴的战略契机,以科技兴农、生态富农、服务惠农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城乡在物质和精神上互通、互动、互补的一体化格局,使市域成为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交错共鸣的场域。三是立足市域“前线指挥部”的关键定位,防控化解政治安全风险、社会治安风险、重大矛盾纠纷、公共安全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弥补治理漏洞,健全预警系统,预防风险外溢,使市域成为重大风险的终结地。四是扮好市域承上启下的枢纽角色,全面协调上下、条块、党政、干群等多维关系,系统融合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等多重手段,科学调配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力量,使市域成为协同创新的新高地。

以法治社会为依归。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依法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实现从“管制”到“管理”再到“治理”转型变革的制度驱动力,是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和显著特征。提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一方面,应重视发挥法治的规范、引领、保障作用,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另一方面,着眼法治本身的现代化价值,把法治作为衡量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依法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协调利益关系、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依法优化营商环境、凝聚社会共识、理顺社会关系、守护社会公正、实现美好生活的同时,把内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的法治,转化为社会成员懂规矩、讲程序、重权利、守诚信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就此而言,法治既是维持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制度手段,也是释放社会活力、助力社会发展的现代资源。

以数字治理为支撑。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科技,是提升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引擎。数字治理不只是把数字要素像零件一样装入社会治理系统实现效率革命,还要实现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标准化、智能化、专业化,提升其质量和效能。面向未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数字科技优势相结合,以主流价值导向引领数字治理水平的提升,必将成为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张亮丽名片。新征程上,以数字治理为支撑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综合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统一的社会信用平台;探索完善数据产权和隐私保护机制,强化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加强数字权利的法理研究,消除城乡区域和群体间的数字鸿沟,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公平现象,避免数字空间内的侵权、垄断和失衡,在算法善治中体现尊重与平等,使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以中国之治为标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而剧烈的变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在增强,风险频发、冲突不断、问题叠加,这构成了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所置身的历史时空。正像中国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对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一样,中国社会治理所展示的巨大优势,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希望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鲜活经验。新征程上,我们要善于把自身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结合起来,在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同时,科学把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与民主化法治化的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的共通性,把握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融贯性。此外,还要善于把创造经验和构建理论相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中寻找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建构具有思想穿透力和话语融合力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理论体系,为人类社会治理文明作出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助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让绿色金融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曲如晓 吴洁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绿色金融主要为促进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提供金融服务,是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催化剂和加速器。推动绿色金融健康发展,对于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切实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具有积极意义。

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为相关领域资金需求和资源优化配置提供重要支撑。发展绿色金融,宏观上要与双碳工作相契合,中观上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微观上要促进金融产品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我国将发展绿色金融纳入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绿色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一些地区先行先试,探索以绿色金融助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生态环境改善的模式;许多金融机构积极开发绿色金融产品。绿色金融在促进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和价值。面向未来,要以更高质效的绿色金融为我国高质量发展赋能。

建立统筹协调的绿色金融激励机制。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既要坚定不移,又要科学有序推进。绿色金融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可以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和调节作用。这就需要有关地方和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在绿色项目认定、绿色金融政策激励等方面形成合力。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建立与双碳目标相容的激励机制,在财政贴息、风险损失补偿、绿色担保等方面给予绿色金融工具更多更实的政策便利,提高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主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积极性。

夯实绿色金融数据信息基础。碳核算和碳披露是双碳工作的基础,也是发展绿色金融的前提。目前,我国重点行业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初步建立,环境信息披露准则相继落地。同时,金融机构的碳核算和碳披露等机制尚未建立健全。为了更好满足绿色项目风险定价、产品设计等需求,促进绿色金融供给更精准、定价更普惠、风控更有效,金融监管部门需要加快出台一系列适应双碳工作需要的绿色金融标准,包括绿色金融产品服务标准、碳核算和碳披露标准、风险管理标准、通用基础标准等,推进绿色金融业务标准化、规范化、透明化。运用“大云物移智链”等技术建立绿色金融数据中心,提升数据和信息支撑度,强化数据安全和合规使用,利用科技手段提升绿色金融发展水平。

增强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供给能力。绿色项目大多周期长、回报率低、风险多,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价值难以精确量化。金融机构可以以提升绿色金融质效为导向,稳健创新推广适销对路的绿色金融产品。加大向新型能源体系、能源保供和转型、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等双碳重点领域的倾斜力度,形成可持续可推广的模式。同时,全方位强化风险防控,有针对性地建立绿色金融监测与分析模型,精准识别各类风险,提升绿色金融风险的预见、应对和处置能力,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提高绿色金融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金融监管部门与生态环境部门可以积极引导资本市场资金资源向绿色实体企业及项目聚集,提高绿色金融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推进资本市场与碳市场联动,让资本市场助力碳市场更好完善价格发现功能,让碳市场助力资本市场更有效优化配置资源,共同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国网英大集团金融研究所)